

石鼓文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about Inscription on Stone Drum

王素

Wang Su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Vol.14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四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石鼓文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about Inscription on Stone Drum

王 素

Wang Su

内容摘要: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石鼓”十个，为唐初天兴（今陕西凤翔）南二十里许出土秦景公（前576~前537年在位）时期遗物，上用大篆铭诗十首，称为“石鼓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主要对“故宫学”创立十年（2003~2013）来，学术界关于“石鼓文”研究的五部学术专著、九篇研究论文、四部十四篇其他论著，依次进行述评。本文认为：这十年来，虽然“石鼓文”研究仍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专著不少，论文和文章更多，但从水平来看，却是大为降低，特别是一些“非专业的研究者”的加入，使之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少论文和文章只有一至二页，最多不过三页，属于评职称的“急就章”，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仅见于“石鼓文”研究领域，其他研究领域也屡见不鲜。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关键词:

故宫博物院 石鼓与石鼓文 研究与述评 质量与问题

ABSTRACT:

The Palace Museum possesses ten "Shigu" (Stone Drums) which unearthed at Tianxing (now Fengxiang Shanxi) during early Tang dynasty. They are relics belong to Qin Jing Gong period (576 B.C - 537 B.C). Big seal characters which called "Shigu Wen" (inscription on Stone Drum) were inscribed on the Stone Drums. Shigu Wen has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so it has been concerned a lot by academic circles. This essay will sequentially comment on five academic monographs, nine research papers, four of fourteen articles of other works about research of Shigu Wen since "Gugong studies" founded ten years before(2003-2013). In this essay's opinion, recent ten years the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Shigu" is still a hot topic in many monographs, papers and articles, but it is greatly reduced from the quality perspective, especially some "non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have brought variety problems. Absolutely the same situation also appeared in other research field. This is worth pondering.

KEYWORDS:

The Palace Museum, Shigu and Shigu Wen (Stone Drums and inscription on Stone Drum), research, problem

* 本文为作者“故宫学学科建设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得到故宫博物院2011年度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谨此致谢！

“石鼓”指唐初天兴（今陕西凤翔）南二十里许出土的一种石（准确应为花岗岩）质鼓状且有铭诗（均为四言诗，通称为“石鼓文”）的珍贵文物，共十个，均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状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与碣更为接近，因其铭诗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猎碣”。“石鼓”在唐已为人所知，唐太宗时苏勖《叙记》、高宗时李贤《后汉书注》均曾提及，杜甫作《李潮八分小篆歌》，韦应物、韩愈分别作《石鼓歌》，使其名声更为大噪。后屡经迁徙，清属国子监收藏，今均属北京故宫藏品。北京故宫专设石鼓馆，常年展陈，成为镇宫宝物之一。

“石鼓文”之名始见韩愈《石鼓歌》，书体为大篆。由于大篆又称籀文、籀书、籀篆，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造，所以最初均言“石鼓”为周宣王之物。如韦应物《石鼓歌》：“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¹韩愈《石鼓歌》：“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搜于岐阳骋雄俊，……凿石作鼓隳嵯峨。”其后遂有主周说，还有主秦说、主汉说、主晋说、主北魏说、主北周说，等等。其中，主秦说始于南宋郑樵《石鼓音序》。王国维 1916 年（丙辰）撰《〈史籀篇疏证〉序》及稍后撰《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等文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奠定了主秦说的基础²。马衡 1923 年撰《石鼓为秦刻石考》，主秦说遂成为了定论。此后关于“石鼓文”的断代，尽管仍然存在较多争论，但大致都以 1923 年为分水岭³，在主秦说范围内进行。

“石鼓”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物，本身就弥足珍贵，加以“石鼓文”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形式涉及文学、音韵，文字涉及书体、书法，千余年来，更一直受到不同学科专家学者的重视，涉足的硕彦可谓难以胜数⁴，相关的成果几乎汗牛充栋。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关于秦国的金文、玉牒、玺印、封泥、竹木简牍等文物文献不断被发现，给“石鼓文”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因此，尽管“故宫学”的创立才仅仅十年，“石鼓文”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分学术专著、研究论文、其他论著三大类，摘要述评如下。

一 学术专著类

学术专著主要有五部，是本文述评的重点。

第一部是王美盛的《石鼓文解读》⁵。

本书前有李学勤的序，认为秦文字自具特色且较为稳定，石鼓文的年代应较宽泛地系于“春秋中期后段

1 按：马衡云：“有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时刻诗者，唐韦应物也。”见：《石鼓为秦刻石考》，《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23 年。但韦应物《石鼓歌》全文具在（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中华书局，2002 年，第 90～92 页），并无一字涉及周文王，疑马衡理解有误。

2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王国维论学集》，第 175～178、第 179～18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3 倪晋波：《1923 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

4 值得引以为傲的是，其中包括的故宫先贤，不仅有前面提到的使主秦说成为定论的马衡，还有在“石鼓”及“石鼓文”研究史上极具影响的唐兰、那志良等，足见从事“石鼓”及“石鼓文”研究原本就应是“故宫人”当仁不让的工作。

5 王美盛：《石鼓文解读》，齐鲁书社，2006 年。

到晚期”¹，而本书推定石鼓文的年代“适在上述范围之内”。正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石鼓文年代，第二部分为石鼓文诠释，第三部分为石鼓文宋拓，第四部分为石鼓文补全，第五部分为石鼓文问答，第六部分为石鼓文艺术。最后为作者的跋。然而仔细推敲，从写作到分析，问题颇多。李学勤的序第1页，“要言不繁”为“要言不烦”之讹，“综括面”为“综括而”之讹，“切人角度”为“切入角度”之讹（第一条恐是原文如此，参见下文；第二、三条应为手民之误），并非作者原文，可以不论。第一部分石鼓文年代本为全书基础，却问题不少。这里仅从该部分第1页举两条并加解说如下。

第一条：

石鼓文自从唐代在陕西陈仓发现以来，即为世人所重。如……宋之郑樵、欧阳修、苏东坡、朱熹，元之吾丘衍、张养浩、陶宗仪……，无不为之付出了心力。

按：首先，石鼓文的发现地，原有关中、陈仓、岐阳、岐山石鼓村、岐州雍城南、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等多说，取其一说并无问题，要在能够说明理由。这里径取陈仓说，没有进行任何说明，就显得不太妥当。特别是天兴县南二十里许之说出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近年已渐成为定论。其次，所列宋四人、元三人，六人皆称名，独苏东坡称号，何以如此，难以索解。但显得不太严肃，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学术著作应该称名，笔记、杂记等才可以称字、称号。最后，将南宋的郑樵（1104～1162）排在北宋的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之前，将年齿稍长的张养浩（1269～1329）排在年齿稍晚的吾丘衍（1272～1311）之后，何以如此，也难以索解。但显得过于随意，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人名排序，自古至今，都是很讲规矩的。这三个问题虽然看似不大，但反映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缺乏学术规范，问题就变大了（参见下文）。

第二条：

第七鼓《西学礼贤》即《銮车》中有“萑允异”一句。允指允姓戎，异即异类，指与华夏族殊异的的外族类。汉李陵《答苏武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按：这里对“允异”的解释太过匪夷所思。“允”通常作诚信、介词以、语气助词解。可以与“允”配搭的词有很多，如允让、允膺、允厘、允怀、允臧等，允异亦不少见。明张宁《方洲集》卷二五《怀远将军杭州右卫指挥翟公墓铭》：“爰总偏师，允异侪匹。”²明李攀龙《沧溟集》卷三《咏古》十六首之五：“多士自允异，燕乐成王猷。”³这些均属常识。因此，对于“萑允异”，通常的解释是：“我此次狩猎收获果然异于平常。”而按照本书的解释是：“我们捕获猱狢异类。”《銮车》全诗谈狩猎，最后一句忽然说到民族战争，堪称突发奇想。至于本书后来根据这种解释，推断此次“捕获猱狢异类”，即《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所记“周大获”，第五鼓《猎归馈献》即《而师》中的“嗣王台”应为周景王，石鼓文应为春秋末期周景王二十年（同前）作，自然也都不能成立。

赵冬梅曾撰《破解千古之谜》一文，对王美盛的这项“成果”进行了详细报导。先称：“此论一出，学界瞩目。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玉哲生前对这一新论极为重视。接到王美盛寄来的论文，王

1 按：此为李学勤的一贯观点。他一直认为：“石鼓大约为春秋中晚期的作品。”见：《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86页，文物出版社（旧版），1984年；第1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2007年。

2（明）张宁：《方洲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7册，第558页下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

3（明）李攀龙：《沧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8册，第204页下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

老不顾九十岁高龄,亲自润色,并推荐到国家中文核心期刊《历史教学》杂志提前发表¹。”接称:李学勤凡“五次审阅书稿”,并为本书撰序,称赞其“综括而要言不繁(原文如此),博通且富有创意”;高明看到王美盛的另一书稿《文源释例》后,也“十分高兴,称赞其研究方法非常科学”,等等²。这些评价与我的看法相差甚远。我认为:王美盛本是书法家,本书关于石鼓文宋拓和石鼓文艺术等部分或许不无可取,但就其整体而言,与严谨、规范的学术著作比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第二部是徐宝贵的《石鼓文整理研究》³。

本书前有裘锡圭的序⁴,先介绍徐宝贵出身农民,自学成才,十分不容易;接着说:“宝贵君用力最勤的是石鼓文。他……认为石鼓文的年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⁵,说服力很强。在石鼓文时代问题上,我本来相信春秋战国之际说⁶,读此文后就相信春秋中晚期之际说了。”最后说:“我向读者郑重推荐这部专著。我当然不敢保证此书中所有的意见全都正确无误,但我敢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石鼓文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部研究著作。凡是学习和研究石鼓文的人,都应该阅读、参考这部著作。”正文分为研究、资料二篇:研究篇分为十部分,依次对石鼓的发现与质地,石鼓文的命名与排序,石鼓文的拓、摹刻、影印、摹写等本的流传,石鼓文的字数、年代与内容,石鼓文的价值及文字考释,等等,逐一进行了学术史的整理,并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资料篇分为六部分,包括各种目录、索引、统计表等。最后为作者的后记。本书分为上、下二册,洋洋洒洒近一千八百页,确实配得上“最全面、最深入”六字评价。但不能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石鼓文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部研究著作”。因为书名(《石鼓文整理研究》)已经自我定性:“整理”在前,“研究”在后。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石鼓文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部学术史整理与研究的著作”。

本书出版后,可以说好评如潮。董莲池称之为“石鼓文研究领域的攻关之作”,认为在石鼓文版本、石鼓文年代、石鼓文文字考释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逐一举例说明⁷。张世超也从石鼓文版本、石鼓文年代、石鼓文文字考释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认为具有材料全、有新见、研究方法科学周密三个特点⁸。董珊的文章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是本书的书评,基本上是依次进行介绍,令人感兴趣的是指出研究篇第七、八、九、十部分的次序或可调整为十、八、七、九,资料篇第一部分“历代有关石鼓文研究目录、论著目录及引书目录”的著录格式不甚统一,等等。后部分表面说是在本书研究的基础上,对石鼓文的字词重新进行探讨,提出补证或新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本书研究篇第十部分“石鼓文字考释”中的一些问题提出

1 按:此指王美盛:《石鼓文年代考》,《历史教学》2002年第8期。

2 赵冬梅:《破解千古之谜》,《烟台晚报》2007年11月5日第7版。

3 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上下册),中华书局,2008年。按:本书在正式出版前,曾拆分成多篇文章零散发表,本文仅注引与讨论问题有关者,其他均予省略。

4 按:此序又载《裘锡圭学术文集》第6卷《杂著卷》,第135~1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5 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国学研究》第4卷,第4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6 按:裘锡圭旧说原文为:“石鼓文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也可以说是前5世纪(如认为秦公簋非景公器,而是桓公或共公器,便可以说前6世纪晚期至前5世纪晚期之间)的秦人所刻的、秦襄公时代的一组诗。”见:《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第48页,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3卷《金文及其它古文字卷》,第3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与此处之“春秋战国之际说”不尽相同。

7 董莲池:《石鼓文研究领域的攻关之作——读〈石鼓文整理研究〉》,《书品》2008年第6期。

8 张世超:《石鼓文研究的最新成果——〈石鼓文整理研究〉评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

商榷¹。

我对本书的看法与他们不尽相同。我虽然同意前揭总评：“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石鼓文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部学术史整理与研究的著作。”但认为问题还是不少。较早赖炳伟曾对徐宝贵自称发现第四种北宋拓本表示质疑姑且不论²。董莲池赞扬本书考证清吴大澂《钟鼎篆籀大观》标目为“赵松雪跋唐拓精本周石鼓文”的所谓唐拓不过是与《金石索》刻本相近的一种并不高明的摹刻本而已³。说得虽然不错，但意义并不太大。就如清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异同评》所说“黄小松（易）武梁祠画像著录唐拓较可信者”之不能成立一样⁴。因为现存石刻拓本，除敦煌藏经洞出有四种唐拓⁵外，传世最早只有宋拓，这在石刻研究领域原本属于常识（另参下文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石鼓文》一书述评）。董珊指出本书研究篇第七、八、九、十部分的次序或可调整为十、八、七、九，资料篇第一部分“历代有关石鼓文研究目录、论著目录及引书目录”的著录格式不甚统一，感觉有点轻描淡写。因为这实际涉及本书整体的架构和规范等大问题。我们知道：石鼓及石鼓文最基础的研究，就是断代；没有断代，其他研究都无从谈起。而本书研究篇十部分，“石鼓文的年代”排在第七部分，董珊觉得还应该再往后调整为第九部分，主次如此颠倒，令人惊异！至于“历代有关石鼓文研究目录、论著目录及引书目录”，编排紊乱，又没有凡例或说明，检索十分不易，难以充分利用。也正因如此，出现重复情况也很难发现。譬如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第896页已经出现过一次，第915页又重复出现一次。还有，本书以详于学术史著称，故宫先贤那志良最早整理石鼓文研究论著目录⁶，“历代有关石鼓文研究目录、论著目录及引书目录”自应利用过那志良的成果，却未见一字提及，也是很不妥的。此外，本书常识性错误很多。譬如：第6页“中唐诗人杜甫”之“中唐”应为“盛唐”之误，第1731页“古人‘悬梁’‘刺骨’发愤苦读”之“刺骨”应为“刺股”之误。而从《元和志》《研北杂志》到各类“方志”，甚至历代“正史”诸“志”，其“志”均写作繁体“誌”，更令人奇怪！按：“志”与“誌”，在道理上虽可通用，在习惯上却极少通用。就像《三国志》极少写作《三国誌》一样。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虽属当下“专家型”研究者的通病，不足为怪，但对本书质量的评判，对本书作者素质的考量，无疑会有不利的影响。

第三部是易越石的《石鼓文通考》⁷。

本书前有王辉、杨逢彬二序以及作者的自序⁸。其中，王辉的序谈到石鼓文的临摹、研究者时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研究者大多不临摹，临摹者大多不研究，只有个别例外，……（如易越石）兼二者于一身。”

1 董珊：《石鼓文考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3辑，第117～1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赖炳伟：《〈石鼓文〉北宋三拓本述要——兼评徐宝贵“又一北宋拓本之发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6期。

3 徐宝贵：《〈钟鼎篆籀大观〉中的石鼓文是较晚的摹刻本》，《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4 参阅：马子云：《谈武梁祠画像的宋拓与黄易拓本》，《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号；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第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5 即：唐太宗撰书《温泉铭》、唐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唐柳公权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无名氏书《佛说大悲陀罗尼经》。参阅：施安昌：《敦煌石室发现的四种碑刻古拓——兼谈中国书籍制度的变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3期。

6 那志良：《历代论石鼓书籍》，《石鼓通考》附录，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另参：苏莹辉：《评那著〈石鼓通考〉》，《台湾新生报》1959年6月19日、26日。

7 易越石：《石鼓文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按：此前易越石曾出版《石鼓文书法与研究》（香港志莲净苑，1998年）。本书是《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的升级版或终极版。

8 按：王辉的序又载：《文博》2006年第4期；《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第274～276页，中华书局，2008年。惟前者作《〈石鼓文通考〉序》，后者作《〈石鼓文论考〉序》，书名有一字不同，不知何故？

必须指出：王辉说的这种现象，近来颇有改变，如前揭《石鼓文解读》的作者王美盛，以及下文将要述评的不少论著的作者，都是“兼二者于一身”的。王辉的序接着谈本书有三项成就：(1) 曾经获得清光绪元年（乙亥）司业汪鸣銮监拓的石鼓文原拓十张，该拓本较明安国旧藏宋拓更为完整；(2) 将石鼓文补订为五百零五字，较阮元翻刻天一阁刻本（四百六十二字）多出四十三字¹；(3) 根据《吴人》鼓中“吴人”二字，推断石鼓文是春秋晚期秦哀公发兵救楚，击败吴军（前 506）凯旋后之刻石，较自己根据秦景公墓出土编磬铭文，将石鼓文定位于秦景公四年至三十二年以及秦厉共公元年至八年，认为景公可能性极大，厉共公可能性极小²，从大的时段说并无矛盾。杨逢彬的序用文言体，主要对本书治学方法进行介绍。作者的自序则主要是对前贤的断代进行评说，对自己新创的秦哀公说的由来进行介绍。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石鼓文的发现与保存，第二部分为石鼓文的年代，第三部分为相关问题的阐述，第四部分为石鼓文的文字与书法，第五部分为石鼓文考释。本书另有附录七篇，均为石鼓文书法作品。最后为易越石弟子陈文禄的后记。总的来看，我认为：作者作为书画名家，据书法补订文字，较前贤多释出若干字，自有这种可能，但据《吴人》鼓中“吴人”二字，推断石鼓文是春秋晚期秦哀公发兵救楚，击败吴军凯旋后之刻石，却与石鼓文整体内容不合，似乎有点牵强。关于《吴人》鼓中“吴人”二字，前人已有很多解说，不能简单否定。

第四部是官波舟的《石鼓文诠释》³。

本书前有杜新民（宝鸡市文物旅游局局长）、任周方（宝鸡市文物旅游局党组书记）二序。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石鼓文》的书法艺术、制作年代、出土地点、出土年代考证，第二部分为《石鼓文》的释文，第三部分为《石鼓文》释疑，第四部分为《石鼓文》拓片，第五部分为探究思絮。最后是后语。本书将《吾水》列为第一鼓，认为：该鼓诗文中的“日佳丙申”，“日”通“时”，“佳”即“维”，而“时维丙申”之“时”应以“年”计，指秦惠文王称王的丙申年（前 325）。该鼓诗文咏述的是这一年的五月，秦惠文王兵马从咸阳宫出发，西去雍州祭祖及陈仓“猎祭”等出行之状。刻石年代亦可确定为这一年的五月。等等。解释太过匪夷所思。“日”与“年”本是两个概念。本书谓“日”通“时”，“时”又同“年”，随心所欲，任意曲说，恐非严肃的治学之道。

第五部是刘星、刘牧的《石鼓诗文复原译释》⁴。

本书作者二人是父子。前有刘星的自序，称自己从二十余年前即开始研习石鼓文，虽至今年近八旬，但已培养其子刘牧为“衣钵传人”。自序最核心部分，是概括本书认识和看法有六：(1) 石鼓的产生与《史记·

1 按：网评又谓较郭沫若考证辨认（四百八十字）多出二十五字。关于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参阅：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商务印书馆初版，1939年，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第3～27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另参：王致中：《郭沫若与〈石鼓文〉》，《郭沫若学刊》1989年第3期；罗业恺：《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述略》，《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

2 王辉：《由“天子”“霸王”“公”三种称谓说到石鼓文的时代》，《中国文字》新20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5年；同作者：《由“天子”“霸王”“公”三种称谓说到石鼓文的时代”一文补记》，《中国文字》新21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年。另参：同作者：《〈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原载《中国文字》新29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收入《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第131～146页，中华书局，2008年。

3 官波舟：《石鼓文诠释》，三秦出版社，2011年。按：本书在出版前曾拆分成多篇文章零散发表，譬如：《〈石鼓文〉制作年代考》，《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日佳丙申”解》，《宝鸡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石鼓文：“发现”还是“出土”》，《宝鸡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秦人第一鼓》，《宝鸡日报》2009年10月23日A8版；《〈石鼓文〉出土地点考》，《宝鸡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石鼓文〉出土年代考》，《宝鸡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等等。本文不一一述评。

4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按：此前刘星曾出版独著之《石鼓诗文复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本书是《石鼓诗文复原》的升级版或终极版。为避免重复，本文对《石鼓诗文复原》不再进行专门述评。

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之事密切相关；(2) 石鼓诗歌是《秦颂》，中心思想是“颂秦德”；(3) 石鼓《秦颂》的倡导人是始皇帝，石鼓诗歌作者是“鲁诸儒生”；(4) 石鼓诗歌内容是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多个”秦人先祖烈宗重大历史事迹的记载和歌颂，石鼓诗歌是一组记录秦人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壮丽史诗；(5) 石鼓产生在始皇二十八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之后一段时间可能性极大；(6) 石鼓最终被弃置荒野而其诗不见流传后世与始皇“焚书坑儒”案有紧密关联。正文分为上、下二编：上编名为“石鼓产生年代及鼓序排列说明”，分为五节，依次对石鼓的断代、性质、诗文内容、刻制目的、鼓序排列等进行介绍和考释；下编名为“石鼓诗文复原译释”，按自己确定的鼓序排列，依次对十鼓进行复原译释。最后为附录的参考资料和参考书目。总的来看，我认为：本书将石鼓文定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二十八年（前 219）之后作，首先就与石鼓文为大篆而其时已流行小篆的大背景不合，有点匪夷所思。本书曾对前揭易越石《石鼓文通考》中的秦哀公说进行批评，认为“易氏欲以‘吴国人’三字涵盖各鼓诗意，然而却忽视了不同石鼓诗篇所具有的与其秦哀公说相矛盾的内容”。实际上，本书也出现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问题。但本书根据《诗经》字句对石鼓文进行的复原，不少还是有创见的，对于石鼓文的文字复原和石鼓文的内容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研究论文类

研究论文主要有九篇，是本文述评的又一重点。

第一篇是吴昊的《石鼓文“会声字”调查》¹。

本文发表于 2003 年岁杪，当时“故宫学”概念才提出两个月，故排为第一篇。本文先从秦国的秦公簋、秦公钟、诅楚文、泰山刻石中找出一些用上古音分析属于特殊形声和特殊会意的字，怀疑古人的造字方法可能不限于传统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然后以石鼓文为对象进行调查、分析和印证，认为还应存在一种“会声字”。但我觉得，其说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地验证。因为作者根据的上古音，是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²，类似的书籍还有一些，如丁声树、李荣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何九盈的《上古音》等³，上古音早已失传，他们所谓的上古音，大致都是根据中古音系的《玉篇》《切韵》《广韵》等往上推出来的，是否准确，也还存在不同的意见。

第二篇是党天正的《“石鼓歌”探幽》⁴。

作者原是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本文所谓“探幽”，自是“探”古代“石鼓歌”的作者与石鼓交流之“幽”。本文依次列举的“石鼓歌”有：清人许孙荃的《石鼓山》诗，唐人韦应物的《石鼓歌》，唐人韩愈的《石鼓歌》，

1 吴昊：《石鼓文“会声字”调查》，原载《中国文字学报》2003年第2期，再刊《中国文字研究》第4辑，第158～164页，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3 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年。

4 党天正：《“石鼓歌”探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北宋苏轼的《凤翔八观·石鼓歌》，明人李东阳的《石鼓歌》，清人高亢的《石鼓歌》，等等。认为他们“或述其产生之由以及发现、认识和揭开石鼓文之秘的前后过程；或赞石鼓文笔势之飞扬生动，字体之庄重古朴；或诉对石鼓的渴慕之情，通过颂扬石鼓之气节操守，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大致属于老生常谈，没有太大的意义。

第三篇是冯时的《〈石鼓·汧沔〉疏义》¹。

按：该鼓首句为“汧沔沔沔”，故一般都命名为《汧沔》；本文称之为《汧沔》，系从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之命名。本文主要认为：其中“黄白其鱗”之“鱗”和“其胫孔庶”之“胫”，以往的释读皆可商榷，需要重新进行研究。“鱗”应读为“景”，今通作“影”，以“鱼”为意符，则应指鱼影。“黄白其鱗”意谓鱼儿黄色白色的身影时隐时现。“胫”本作“翊”，盖指肉羹。“其胫孔庶”意谓肉羹既多且美。与以往释读不尽相同，可备一说。

第四篇是李向阳的《秦石鼓文与渔猎文化研究》²。

本文为硕士论文，前有摘要、绪论，后有小结、参考文献、附录（石鼓文拓片及十鼓文字复原）、后记等。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石鼓文时代问题，第二部分为石鼓文田猎的性质，第三部分为石鼓文中渔猎活动的地点及其环境考察，第四部分为渔猎方式及其工具使用，第五部分为春秋时期秦人渔猎及其地位。总的来看，我认为：根据石鼓文探讨秦国渔猎文化，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关于石鼓文的断代，并未与时俱进。摘要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如马几道、陈昭容等坚持‘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的说法在目前没有新的材料及考古发现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提法。”小结归纳：“石鼓文是秦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一次渔猎活动的反映。”仍然支持已经过时的观点，反映对新的断代成果缺乏应有的判断。

第五篇是倪晋波的《秦系文字的时间序列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³。

本文作者曾撰《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已见前文注释。该《研究述要》的学术史梳理，仅到2005年为止。本文则具有一定的接续的含义。本文认为近年关于石鼓文勒制年代研究有两种新思路：第一种新思路由黄奇逸、陈昭容等提出，认为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只能求得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第二种新思路由裘锡圭、徐宝贵等重提，认为石鼓刻文与石鼓诗作存在时间上的矛盾，二者有可能不同时代。本文认为“相对年代”说较为务实和可行，便综合现存秦国之金、石、陶文，先进行字形比较，再进行时间排序，最后断定：石鼓文的勒制时间在春秋中晚期。这个春秋中晚期的断代，虽然与前揭徐宝贵的断代相同，但求证的方法和途径不尽相同，应该具有一定的新意。

第六篇是高明的《论石鼓文年代》⁴。

本文的结论是：石鼓文制作当在秦惠文王废“公”称“王”改元后的十四年之内。这首先是因为它的字形结构与战国晚期的秦国陶文乃至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以及李斯制定的小篆极其相似。另外，石鼓文的制作年代，与凿制使用的工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类似花岗岩硬度的石鼓上刻字，青铜工具难以胜任，必

1 冯时：《〈石鼓·汧沔〉疏义》，《古文字研究》第26辑，第391～395页，中华书局，2006年。

2 李向阳：《秦石鼓文与渔猎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3 倪晋波：《秦系文字的时间序列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4 高明：《论石鼓文年代》，《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须质坚刃锐的铁制工具。而我国铁器的广泛应用是在春秋以后，这对石鼓文制作年代当为战国时期提供了很有利的证据。结合这两个因素，再进一步分析石鼓文中秦君既称“公”又称“嗣王”的特点，则非战国中晚期的秦惠文王而莫属。秦都咸阳虽距凤翔一百余公里，但秦惠文王死后埋葬在祖籍陵区是完全可能的。如此，则石鼓陈于墓前神庙，诚为郭沫若所言：“其用意实犹后世神祠佛阁之建立碑碣。”虽然言之凿凿，但问题仍然不少。譬如：石鼓文中的“嗣王”，一般都认为是指周天子。《銮车》：“口（彤）弓孔硕，彤矢口口。”此处的“彤弓”“彤矢”，均为古代天子赐给有功诸侯使专征伐的信物。《尚书·文侯之命》：“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孔传：“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后专征伐。”“彤弓”“彤矢”可以与“嗣王”互证。而秦惠文王为秦之始称王者，他的继承者才能称“嗣王”，将“嗣王”说成是秦惠文王，于理不合。总之，本文的主要观点，恐怕很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第七篇是王春晓的《石鼓文谜底的疑点与契合点——姚大荣〈石鼓文足征记〉研究》¹。

王春晓的这篇论文在《贵州文史丛刊》刊发，研究的也是贵籍人士姚大荣的《石鼓文足征记》，因而具有一定的地缘情感。清人俞正燮《答成君瑾书》认为石鼓产生于北魏，创立了所谓北魏说。姚大荣的《石鼓文足征记》支持北魏说，而本文经过比较又支持姚大荣之说。在主秦说已经成为定论、秦景公说几乎成为定论的今天，还能重拾已经被人遗忘了的北魏说，是值得学术界深思的。

第八篇是施安昌的《乾隆与石鼓文》²。

本文主要根据故宫乾清宫旧藏石鼓文拓本及相关御制诗文，对乾隆皇帝传拓、考校石鼓文和重刻石鼓、重编石鼓序列等几件史事进行梳理，说明乾隆皇帝本人对石鼓文怀有浓厚兴趣，一方面奉为“千秋法物”，一方面也从中得到启发，一再提出和阐明“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的文治思想，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发展。其中附录相关图版多幅，部分可能属于首次发表，为研究乾隆皇帝与石鼓文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九篇是王娇的《石鼓文语言艺术研究》³。

本文先指出：前人对石鼓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鉴赏、摹刻、书法、年代、顺序和注释等方面，对其语言艺术较少关注。然后，通过研究分析，认为：石鼓文的语言艺术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变换用韵，多用叠音词，使文章韵律和谐；二是善于运用赋、比、兴等表现手法，使作品相得益彰；三是善于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使描写的场面形象生动。在句式上也灵活多变，陈述、疑问、设问等交叉运用，散发着浓厚的诗歌艺术魅力。这些特征使它具有先秦时期其他石刻铭文所无法企及的语言艺术魅力。虽然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总觉得不少属于套话。尤其想知道的是：“先秦时期其他石刻铭文”云云，不知“先秦时期”除了石鼓文、诅楚文外，还有哪些“石刻铭文”？

1 王春晓：《石鼓文谜底的疑点与契合点——姚大荣〈石鼓文足征记〉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3期。

2 施安昌：《乾隆与石鼓文》，《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

3 王娇：《石鼓文语言艺术研究》，《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期。

三 其他论著类

石鼓文研究的其他论著较为复杂，本文分为字帖书画、知识介绍、评论综述三小类进行述评。

(一) 字帖书画

字帖书画主要有著作二部和文章九篇。

第一部著作是杨宗兵的《石鼓文新鉴》¹。

本书为书法新鉴丛书之一种。前有书法新鉴丛书编委会的前言，介绍这套丛书共六种，都具有新材料、新视野、新文风三个特点，等等。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石鼓概况，第二章为石鼓文摹拓刻印，第三章为石鼓文研究简史，第四章为石鼓文书法风格，第五章为石鼓文形体特征，第六章为石鼓制作缘由及其年代新考，第七章为石鼓题咏诗选。最后为附录二篇：一为石鼓文宋拓先锋本缩印本，一为石鼓文研究论著目录。总的来看，虽然发现地点仍取陈仓说，时间断代仍取清末震钧等的秦文公（前765～前716）说，并无新意；在明安国旧藏三种石鼓文宋拓中，先锋本保存字数最少，附录选先锋本缩印，也未见高明；但作为一部以讨论书法为主的著作，学术史的梳理较为清楚，考证与评论也大致都能自圆其说，还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

第二部著作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的《石鼓文》²。

本书为中国书法宝库丛书之一种。前有简介，虽然发现地点仍取陈仓说，时间断代仍取唐兰秦献公十一年（前374）旧说，并无新意，但“唐时即有拓本，惜今未传，近时所见以北宋本为最……”云云，却较前揭徐宝贵的《石鼓文整理研究》有见地。正文是将明安国旧藏石鼓文宋拓后劲本影印作为篆书字帖。在明安国旧藏三种石鼓文宋拓中，后劲本保存字数较少，残泐程度也较重，将后劲本影印作为篆书字帖，显然并非最佳选择。最后附有薛元明撰写的临习要点。薛元明作为书法评论家，对于如何临习石鼓书法，应有独到见解。

第一篇文章是李冰兵的《论石鼓文在中国书法教育事业的重要地位》³。

本文从石鼓文的研究价值和石鼓文是“书家第一法则”（此语原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两个方面，论证“学习石鼓文在当代书法教育中的必要性”，说明石鼓文在中国书法教育事业占据的重要地位。其中，关于石鼓文研究价值的论证，大致属于老生常谈；关于石鼓文是“书家第一法则”的论证，也缺乏新意。

第二篇文章是余巨力的《石鼓文和秦小篆》⁴。

本文主要介绍先秦石鼓文的大篆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书同文”改革确立的小篆在书法上的特点。譬如：称先秦大篆“摒弃了金文中明显的装饰意味，更趋粗象、成熟；用笔以中锋圆笔为基调，结体保留了

1 杨宗兵：《石鼓文新鉴》，书法新鉴丛书之一种，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按：本书又曾拆分成多篇文章零散发表，譬如：《历代石鼓文及其时代研究综述》，《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年第2期；《〈石鼓文新解〉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秦石鼓文形体特征、书写风格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石鼓文及其时代研究评述》，《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二马、三堂”与秦石鼓考证》，《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石鼓制作年代综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等等。本文不一一述评。

2 本社编：《石鼓文》，中国书法宝库丛书之一种，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

3 李冰兵：《论石鼓文在中国书法教育事业的重要地位》，《科技信息》2008年第33期。

4 余巨力：《石鼓文和秦小篆》，《金融管理与研究》2011年第3期。

金文的随字赋形的特点,但已有规整化倾向”。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小篆“笔画圆转劲健,犹如玉箸(筷子)”,等等。也都属于老生常谈,缺乏新意。

第三篇文章是郝永飞的《略论〈石鼓文〉的历史价值、艺术特色和影响》¹。

本文从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石鼓文》艺术特色、受《石鼓文》影响的书家等几方面,谈《石鼓文》的历史价值、艺术特色和影响。其中,谈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重点在于介绍石鼓本身的迁徙和遭遇;谈《石鼓文》艺术特色,重点在于介绍书法特点,诸如朴茂雄秀,浑厚自然,体态优雅,布白整饬,等等;谈受《石鼓文》影响的书家,由于各朝各代人物众多,只能举要概说。都是人所熟知的人和事,自然也都属于老生常谈,缺乏新意。

还有六篇,都是谈吴昌硕临《石鼓文》或《石鼓文》对吴昌硕书画影响的文章²。吴昌硕(1844~1927)作为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所临《石鼓文》也极具艺术价值³,《石鼓文》对其书画创作也极具影响。但这些情况,学术界、艺术界已经研讨了将近一个世纪,没有深厚的学养和积累,很难再说出新意。这六篇文章都是缺乏新意的老生常谈,这里也就无须多费笔墨述评了。

(二) 知识介绍

知识介绍主要有著作二部和文章三篇。

第一部著作是丁孟的《石鼓史话》⁴。

本书前有前言,主要简述石鼓的质地,石鼓文的形式、内容及雕刻艺术、书法艺术等。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石鼓的发现与迁徙,第二部分为追本溯源,第三部分为石鼓文的内容,第四部分为石鼓的赞歌。最后为附录,主要是石鼓的近照与石鼓文的拓本。前揭倪晋波的《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将述要时间截止于2005年底,没有介绍此书;前揭徐宝贵的《石鼓文整理研究》2008年1月出版,其中“历代有关石鼓文研究目录、论著目录及引书目录”也未收此书。不知是有意忽略,还是无心疏漏。本书出自石鼓收藏地——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之手,作为知识介绍著作,自应有其独特的看点。

第二部著作是刘佳的《话说石鼓文》⁵。

本书前有李学勤的题词,孙长林的序以及作者的自序。李学勤的题词是韦应物《石鼓歌》中的名句:“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冥。”孙长林的序主要站在美术家的角度对本书进行评介。作者的自序主要谈撰写本书的缘起。此前,作者曾撰写、出版过《话说甲骨文》⁶,也是一部知识介绍著作,故称二书为“姊妹篇”。正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中国第一古物,第二章为石鼓春秋,第三章为石鼓文拓本、翻刻、影印及石鼓复制,

1 郝永飞:《略论〈石鼓文〉的历史价值、艺术特色和影响》,《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6期。

2 杨豪良《〈石鼓文〉原作与吴昌硕书〈石鼓文〉之比较》,《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7期;关杰:《石鼓文对吴昌硕写意花鸟艺术的影响之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陈维彪:《吴昌硕对石鼓文的理解与创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与发展初探》(会议文本),2010年6月10日;李维:《吴昌硕的〈石鼓文〉及其对后人的影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关杰:《论吴昌硕画作与石鼓文书法之渊源》,《大舞台》2012年第2期;同作者:《石鼓文的结体章法对吴昌硕大写意画造型的影响》,《美术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

3 吴昌硕:《吴昌硕临石鼓文》,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4 丁孟:《石鼓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5 刘佳:《话说石鼓文》,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

6 刘佳:《话说甲骨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

第四章为文学家与石鼓文，第五章为金石学家眼中的石鼓文，第六章为石鼓文书法。最后为附录二篇：一为先锋本石鼓文拓片，一为参考书目。总的来看，虽然发现地点仍取陈仓说，时间断代仍取李学勤春秋中晚期（前 766 ~ 前 659）说，并无新意，但作为一部知识介绍著作，视野较为广阔，内容较为全面，还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

第一篇文章是阎敏的《陈仓石鼓与石鼓文》¹。

本文从石鼓的流传、石鼓之谜任评说、石鼓的制作年代及其文字内容、石鼓文的文字和书法价值等几方面，介绍石鼓与石鼓文。总的来看，介绍还算客观，对于前人的观点有所取舍，没有一味盲从。譬如发现地点虽然赞同李仲操的陈仓说，时间断代却没有继续赞同李仲操的秦宣公四年（前 672）说²。

第二篇文章是李彬的《石鼓文研究》³。

本文只是一篇区区两页的简单的介绍性文章，却取了一个大得吓人的研究性题目。问题并不止此。摘要说：“《石鼓文》的发现成为秦史研究和古地名、古动物的不可多得的史料。”不合语法。正确应为：“《石鼓文》的发现成为秦史研究和古地名、古动物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全文分绪论、石鼓文的发现和研究现状、承前启后的石鼓文、结论四部分，即使是介绍也很不完整。

第三篇文章是蒋明的《石鼓文年代之谜》⁴。

本文主要介绍关于石鼓文年代的争论和观点，但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谈到主秦说成立之后说：“先后形成了‘秦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秦襄公之后献公之前、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徙雍以后、秦穆公、秦灵公、秦昭王、秦献公、秦德公、秦宣公、秦宁（宪）公以后之武公、秦武王、秦昭王、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距秦公簋近些，离诅楚文远些）秦景公’等十五种说法”。其中所引“秦惠文王”至“秦景公”一段，没有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仅知括号内“距秦公簋近些，离诅楚文远些”一语出自陈昭容⁵。除去此语，所谓“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秦景公”云云，就有问题，秦景公（前 576 ~ 前 537 在位）属于春秋，不属于战国，应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三）评论综述

评论综述的文章应该说有很多，但由于此类文章缺乏学术规范，水平参差不齐，且很容易彼此参考甚至是彼此抄袭，本文仅选二篇较有影响者进行述评。

第一篇是李明晓的《近十五年战国玉石文字研究综述》⁶。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战国”，并非断代史上的战国时期，而是将春秋时期也包括在内的一个新的称谓。这种称谓不知始于何时。但知李学勤四十多年前撰写《战国题铭概述》时，他的“战国”是不包

1 阎敏：《陈仓石鼓与石鼓文》，《文博》2007年第6期。

2 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同作者：《石鼓出土地及其在唐宋的聚、散、迁》，《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

3 李彬：《石鼓文研究》，《华章》2012年第4期。

4 蒋明：《石鼓文年代之谜》，《书法赏评》2012年第5期。

5 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4分，第1077~1120页，1993年。

6 李明晓：《近十五年战国玉石文字研究综述》，《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年第2期。

括“春秋”的¹。现在则不同。如丁秀菊所说：“战国文字，目前学界一致认为它是指春秋战国间的文字，即始自春秋终至秦灭六国时期的文字，历时约五百五十年。”²因此，本文分五类综述近十五年的战国玉石文字研究，是将春秋中晚期的石鼓文研究放在第一类首先综述的。这一点，与发表早于本文的王建莉的《战国玉石文字研究述略》极为相似³。本文对石鼓文研究的综述，重点仍然放在石鼓文年代方面，但不是泛泛介绍，而是有倾向性的。譬如认为尽管过去说法很多，但惟陈昭容的“石鼓文的制作应晚于秦公簋，早于诅楚文”的结论“颇为谨慎与可信”，因而“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石鼓文的制作年代应在秦公簋和诅楚文之间”。

第二篇是倪晋波的《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⁴。

本文对石鼓文研究的述要，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重点也都是放在石鼓文年代方面。譬如内容提要称：“马衡在1923年发表的《石鼓为秦刻石考》揭开了‘石鼓文’研究的新帷幕。自是迄今的‘石鼓文’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新学初盛’（1923～1949）、‘相对沉寂’（1950～1979）、‘全面发展’（1980～2005）。三个时期的研究各有特色，而以对石鼓年代的争论贯穿始终。”本文值得重视之处不少，最为我所关注的是，充分肯定了故宫先贤马衡、唐兰对石鼓文年代研究所做的贡献。马衡的研究，使主秦说成为了定论，自是人所熟知，无须赘述。但他的功劳并不止此。他在当时材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仅据旧出的秦公簋等铭刻资料，就断定石鼓文与秦公簋同时，这是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素养的。他的问题仅在于将秦公簋系于秦穆公时，从而也将石鼓文系于秦穆公时。唐兰也是在材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仅据已经改系于秦景公时的秦公簋和时代稍晚的诅楚文等铭刻资料，就断定石鼓文“应该在（秦）景公之后，跟诅楚文接近”⁵，这也是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的。前揭陈昭容断定石鼓文“距秦公簋近些，离诅楚文远些”，可以说实际渊源于此。20世纪70至80年代，陕西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墓出土编磬铭文明确说是秦景公作，其文字结构亦与石鼓文接近，证明马衡、唐兰的判断非常正确。这是值得“故宫人”引以为傲的。

综上述评，可以看出，尽管只有短短十年，关于“石鼓”与“石鼓文”的各类论著，仍在不断发表与出版。据前揭倪晋波统计，1980至2005年的二十五年间，关于石鼓文的论著，有九十二篇部之多，其中专著有九部，论文有八十三篇。然而2003至2013年的十年间（其中有两年与前者重合），关于石鼓文的论著，竟然可以与之相当，专著等著作有九部已见本文述评，论文等文章（包括将专著拆分零散发表的文章）也决不少于八十三篇。这充分说明，“石鼓”与“石鼓文”研究，仍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从水平来看，却是大为降低。倪晋波曾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非专业的研究者”，从事石鼓文研究，出版的多部专著，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对此我深有同感。他还指出：

随着学术开放性和公共性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石鼓文研究领域，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1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原分上、中、下，刊于《文物》1959年第7、8、9期，后合并为一书，《文物·考古专刊第一种：考古·文物学史》第二号，香港，神州图书公司，1974年。

2 丁秀菊：《20世纪战国文字研究的反思》，《南昌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 王建莉：《战国玉石文字研究述略》，《集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4 倪晋波：《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49年。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

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最突出的便是“石鼓文千年之谜破解论”不绝于耳。最近浙江某媒体发布新闻称，舟山一市民成功破译了“石鼓文千古之谜”。其实，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中央级的媒体纷纷报道陕西一青年破解“石鼓文之谜”以来，或由本人搦管公告天下，或由他人捉刀摇旗呐喊的类似消息屡现报端。可是结果呢？要么被学者戳穿而成笑谈，要么喧嚣一时终随风逝。修学好古，致力于解答学界难题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学术探索不是猎奇冒险，更不是炫名取宠的手段，它应该以事实为基础，以严谨、求真为根本态度。所以，以讹传讹的“石鼓文千年之谜”不提也罢，而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对当前的石鼓文研究尤为重要。

这种情况在本文述评的这十年间，也屡见不鲜。还有一种情况倪晋波没有谈到，这就是不少论文和文章，只有一至二页，最多不过三页，属于评职称的“急就章”，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仅见于“石鼓”与“石鼓文”研究领域，其他研究领域也屡见不鲜。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